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从信息传递到价值共鸣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李敏 周光凡

守住话语内核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表达形态的国际性适配,拒绝“削足适履”和“自说自话”。没有自主的内容生产与翻译机制,就没有真正的话语自主;不能筑牢可传播、可认同的内容底座,就难以实现从表层信息传递到深层价值共鸣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要求“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破解主体性与国际性的二元对立。所谓主体性,是必须坚守的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实践根基,是摆脱西方话语依附、实现话语自主的核心灵魂;所谓国际性,是必须具备的跨文化适配性、全球议题共通性、国际传播说服力,是中国话语真正“走出去、立得住”的必要条件。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话语转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石。
话语转化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首要环节,本质是在牢牢

“西方定规则、我们来诠释”的被动局面下,即便有实打实的发展成效也较难转化为话语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注重构建包含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积极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认可的标准与共识,逐步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定义者的跃升。

央地协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组织保障。

国际传播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主体的系统工程。只有构建与完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打通“自上而下”的顶层引领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支撑,才能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其中,央地协同是一个关键支撑,本质是通过组织机制创新实现国家叙事指引与地方叙事落地与优化的辩证统一,进而以传播合力连接内容基石与规则跃升。

研究显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组织痛点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如“上下一般粗”的同质化传播。国家宏大叙事直接照搬套用,未结合地方实践开展在地化、国际化适配,导致陷入空泛化、口号化的困境。如地方叙事的碎片化传播,各区域、各主体自行其是,缺乏统筹协调,不仅形不成传播声势,甚至会出现偏离国家叙事主线、消解话语主体性的风险,最终陷入“国家叙事落不下去、地方叙事提不上来”的双向脱节局面。

表达创新与精准触达

在一个复杂和喧嚣的世界中,要

让人喜欢一个国家、记住一座城市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实践证明,话语叙事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产出效应,甚至可以变营商环境的成本项为增值项。国际传播亦早已不是单纯的文明交流,而成为全球资源链接、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战略资本。只有坚持软实力与硬实力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深度融合,才能在外部多重约束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多个目标平衡中求得最优解。

城市作为连接宏观国家叙事与微观生活实践的枢纽,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场域。上海的城市叙事实践既承载国家话语的地方转化功能,又具备国际可比性与对话能力;既深入阐释国家战略、核心理念的本真意涵,牢牢守住话语主体性,又运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体验、可衡量的城市故事。

比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叙事,上海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话语转化为连续举办多年的进博会实践,用国际商界可共情的合作机遇叙事、全球发展共赢叙事传递中国的核心立场,既不迎合西方“自由贸易”的刻板框架,又实现“内核不变、表达创新、精准触达”。

又如,围绕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公众安全感综合测评指数连续13年提升的平安城市实践、“一江一河一带”千座公园的绿色生态建设成果,用民生细节、生活场景成价值理念的具象化表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有意识地突破叙事的单一维度,进一步激活民间主体的话语转化活力,构

建起多元、立体的自主内容生产体系。国内外主播纷纷通过镜头展现城市夜间治安、交通便捷度、移动支付普及度,相关内容在全球主流网络平台的总观看量破亿。同时,依托电竞产业、国风动画、国产游戏出海的产业优势,发挥Z世代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搭建起中西方青年群体的全球对话桥梁,让民间叙事成为官方话语的有效补充。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深化话语创新、优化传播路径。客观地讲,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城市的“营销一品牌一叙事”体系运营了几百年,熟悉而又老练。上海城市叙事文本应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导,将“人民性”嵌入城市叙事基因,拓展民间话语的音域和音量,把“城市是谁、想成为什么”翻译为可被多元主体理解与认可的话语和实践。

具体而言,可把握经济和治理的两条主线,传递“中国创造”与“上海技能”的力量,用好科技向善、平安城市、美丽上海等视角,展现可感、可知、可体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气象,实现从参与规则到贡献规则、从阐释事实到定义价值的质变,为中国话语真正“走出去、立得住”提供实践样本。

(作者分别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城市治理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社会发展与人文综合教研分部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思想: 标识性原创性概念

西迁精神鲜明底色

■周凯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要“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西迁精神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在岁月洗礼中历久弥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迁精神的鲜明底色集中体现为“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政治品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使命担当。

一是“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

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始终胸怀“国之大事”,将自身发展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和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做到与党和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当年,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初衷并非培养熟读经史子集的“书生”,而重在培养熟悉法政外交等实务的实干人才。

近代以来,铁路被视为国家命脉。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立,旨在为中国铁路建设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从而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夺回被列强控制的路权。

1921年,上述三所学校合并组建为交通大学,为的就是“交通救国”——以发展交通事业为基础,增强国家实力。

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师生从上海内迁至西安,承担起国家战略需要的历史责任,彰显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崇高品格。这种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抉择,使西迁精神成为诠释“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生动典范。

如今,四所交通大学虽地处东西南北,但根脉相连、心气相通,“求实学、务实业”的办学宗旨一以贯之,兴学强国、育才兴邦的使命担当从未改变,胸怀大局的精神气质薪火相传。

二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政治品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高等教育与工业布局亟待调整。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国防建设全局出发,作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战略决策。从1956年开始,数千名交大师生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黄浦江畔奔赴渭水之滨,以“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豪情壮志,开启扎根西部、艰苦创业的壮阔征程。

1959年,党中央希望充分利用上海的地缘优势与工业基础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科技力量、人才力量时,独立建制后的上海交通大学在学科体系几近“归零”的情况下,投身国防现代化建设。从“两弹一星”的惊天壮举,到核潜艇研制的深海无声,再到船舶工业的劈波斩浪,党中央需要什么,交大人就攻克什么、奉献什么。正如上海交大1963届校友、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曾追忆求学岁月时立下的“航天报国”之志:“祖国需要火箭,我用一生完成了这个答卷。”

传承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党指挥跟党走”,勇于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三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使命担当。

西迁精神的实践指向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五”时期,新中国开始将工业建设重点转向内陆。当时,西北地区高校偏少,科技与人才储备极度匮乏,难以支撑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客观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大西北的工业建设注入急需的科研能力和人才储备,成为西迁精神的历史起点与实践逻辑。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西迁精神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蕴。当前,我们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迫在眉睫。无论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甘坐冷板凳、勇闯未知之境,还是在关键技术攻关中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无论是奔赴边疆基层、投身乡村振兴,还是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都是西迁精神在今日中国的生动实践。

传承弘扬西迁精神,是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的坚守,是勇闯前沿、敢为人先的锐气;是艰苦创业、攻坚克难的韧劲,是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的担当。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梁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在确立学科范式之初,很大程度上主张从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挑选出符合西方哲学框架的材料而叙述之。如此这般“照着”西方哲学建构中国哲学,难免有自主性不足之弊。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近年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门类 and 重要组成,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日益成为学界的自觉意识。无论是“汉语哲学”的方法论主张,还是“仁学本体论”“具体形上学”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说,都从各自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贡献力量。

■何山青

上海紧扣国家战略,积极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轮驱动路径,并基于制度、技术与空间的系统重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战略部署,不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制度逻辑:从“外部约束”到“内生激励”的治理范式转换。

比如,构建跨域协同的利益共享机制,破解行政区划壁垒。通过统一跨省域水质监测标准与考核体系,上海联合江浙两地建立“环境成本共担、生态红利共享”的协同模式,将“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具象化。同时,创新推行“生态补偿+碳汇交易”机制,允许辖区内高排放企业购买周边地区的林业碳汇以抵消自身排放。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解决了生态保护与融资难题,更让其他地区的“绿水青山”通

当代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以此为起点,我们实事求是“是”,事上明“理”。一开始,也许只能提出若干零星具体的理论观点,但只要久久为功,积累到一定阶段,就有望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理境,进而形成内生性的、系统性的中国哲学学说。

这样的学说自然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因为它没有拿某种现成的外来理论作为“方便的起点”,而是有意识地回到“实践的粗糙地面”开始艰苦的思想劳作,最终以自主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体现时代精神。

第一,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主张“中国特殊论”,亦非重新落入西方中心论者所利用的普遍主义窠臼。

西方中心论或者强调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的具有优越性的文明,认为优胜的西方文明理应凌驾于其他文明(包括持论者自身所在的文明)之上并最终取代之,或者将西

方文明标榜为人类普遍文明化身,从而以普遍性的名义要求其他文明以其为榜样改造自身。我们不会以“中国中心论”代替西方中心论,而是努力在更高的维度上超越西方中心论。

第二,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扎根当代中国的实践与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

这并非以中国自限,亦无意主张中国哲学优越论。相反,我们寻求共通性,并怀着对人类未来文明的关切,而自觉走向世界哲学,自觉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在起点上,将世界纳入立场,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远思;在过程中,保持开放,将世界纳入视野,努力会通东西不同文明;在结果上,开放的远思不是闭门独思,而是在积极回应世界学术共同体批评意见的过程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哲学理论,进而实现“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第三,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别需要注意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要关注中西文明之外的其他文

中国哲学何以形成特色和优势

明形态,也不能忽视具体文明内部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试举例阐明之:面对文明冲突乱象,我们迫切感受到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性,并发现中国哲学自古以来便有重视和谐共生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考察,和谐共生理念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传统(包括西方文明传统)之中?比如,日本哲学家、德国哲学家、法国哲学家等曾以不同的方式阐发过类似理念。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便是让不同文明传统中或隐或显、或强或弱、或旧或新的和谐共生理念相互对话,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当代人类文明语境下的和谐共生理论,进而滋养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既是扎根当下的,也是面向未来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内在呼唤“人为万物之灵”替代“人为万物之主”。

哲学在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时,不免要直面“人类中心论”这一课题。“人为万物之灵”在肯定人的自主

性、高扬刚健进取精神的同时,把人理解为居于天地之中的存在者,天地万物的福祉是人的内在构成要素,尽物之性、参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实现人之为人过程。这里的要义在于:人并非与自然隔绝或对立之我;无论在本体论意义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自然就是目的本身。

概而言之,在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成就自我”。这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自我超越。它以中国文明为主流又容纳其他一切文明,具有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的品格。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东方哲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轮驱动路径

过市场化手段直接变为“金山银山”,实现区域间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统一。

又如,深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提升绿色金融话语权。上海充分发挥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平台功能,推动碳配额从电力行业向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扩容,并积极探索碳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同时,深化“碳普惠”机制,将居民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等行为量化为可交易的碳积分,打通微观主体参与宏观治理的通道。临港新片区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开展跨境绿色金融试点,积极探索并逐步打通人民币结算跨境碳资产交易的新通道。这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绿色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折射制度型开放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技术逻辑:以绿色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竞争优势。

变。通过生态修复技术保留工业遗产并植入绿色功能,将“工业锈带”转化为“生活秀带”和“创新秀带”,实现土地价值的倍增。“技术铺路、场景变现”的模式,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证明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优质的营商环境,让生态约束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倒逼机制”、演化出产业发展的“牵引机制”。

又如,零碳园区培育绿色产业集群。谁掌握了绿色核心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就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响应“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的号召,上海在嘉定氢能港、青浦华为研发中心等地开展先行先试。通过构建“制氢一储氢一用氢”全链条闭环和“湖水冷却+光伏供电”的绿色算力中心,不仅大幅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还能吸引大量跨国企业和高附加值环节入驻。

空间逻辑:构建“三生融合”的国土空间新格局。

在滨水空间,从“单一功能”向“复合价值”跃升。黄浦江两岸的开发不局限于单一的航运或居住功能,而是通过“工业锈带+科创秀带”的转型,打造集研发办公、休闲游憩、生态保护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在城市核心区,保持高绿化率与适度开发密度的平衡,既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为高端科创企业提供优越的营商环境,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双增值。

在产业园区,从“物理集聚”向“化学融合”迭代。张江科学城、奉贤东方美谷等园区的建设,不是简单的企业堆砌,而是在通过建设国家级零碳园区、推行“生态准入负面清单”,构建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高密度的绿色融合模式,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证明绿色园区同样可以创造高频率的经济产出,实现产业集聚与生态友好的良性互动。

在城乡区域,构建双向赋能的融合发展格局。崇明岛坚守“生态立岛”定位,通过推广“稻鱼共生”“林下经济”等生态农业模式,在保护生态本底的同时发展高附加值的绿色农业。同时,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托碳普惠体系,允许市区企业通过投资崇明、青浦等地的乡村林业碳汇项目,获取碳减排量用于企业碳中和。这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活水,也能够为城市发展拓展生态腹地,形成“城市反哺乡村、乡村涵养城市”的良性循环。

总之,上海积极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轮驱动路径,一个核心启示在于: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经济发展的“刹车片”,而是转型升级的“加速器”;绿色低碳转型不是被动应对的“成本项”,而是主动布局的“增长点”。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